

座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提議

拆去存在的牆，消除黨群隔閡， 加強團結，發揮作用

近來報紙上有“办好学校，必須拆去黨群間存在的牆”的提議，这个提議，我是十分贊成的。我自鋼院建校起就來了，為時將達五年，而對於學校情況，知道的不多；對於學校領導，聯繫的不够，察其原因，就是因為黨和群眾之間存在有牆的關係，首先，彼此互不了解，遇事盡凭傳達，日久發生誤會，變成矛盾。這不僅我一人為然，同志中有些感覺的也頗不少。聽到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可以證明。長此下去，對於我們鋼院前進，更要發生不利影響。因此我也提議在鋼院中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首先是拆去存在的牆，使黨群之間，沒有隔閡，能多接觸，加強聯繫，彼此發生感情，矛盾自然解決。

去掉官僚作風，尊師重道，使教 學工作進步

我國自來就有鄙視“官僚架子”的優良風氣，就是說官可作，官僚架子不可有，又有“官居一品，不壓多黨”的傳說。說學校是一個培育人材的處所，並非官廳，校長是學校的領導，也就是主人，而教師是先生。孟子上說：“待先生如此其尊且敬也”。再道是指學術，學校中自當以學術為重的，因為我們辦學校的目的是為了造就人材，人材的造就，實有賴於教師。學校主人對待先生有禮貌，才能將先生的學術，積極的發揮出來，交給學生，為祖國造就人材以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因此，我提議在我們學校中應當從此將官僚作風，徹底地去掉，實行尊師重道，至所有教職人員，彼此均應當虛心接受批評，互相幫助，使學校工作進步。

提任各級主任的教師，應當使他們 有職有權，努力工作

我近讀人民日報，清華大學錢偉長同志說“我是老清華了，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並鄭重地又說“高等學校應該靠老教授”。我對他在報上發表的一切言論，雖沒有多用很多時間加以閱讀，不過我自己有個私人的體會，我以為一個人能在教育界（特別高等學校里）擔任較長時期的教學工作，實在是一個不容易的事。現在不同了，在國民黨或以往北洋軍閥時代，校風自由散漫，學生對於教師甚至校長稍不如意，即行群眾驅逐。因此，在彼時擔任教師的，能在學校里不受驅逐，繼續教學，實在是不簡單的。為教師的如果不是學有特長，並具有優良的教學能力，絕不能經過許久年月。再則彼時的教師是自由職業，其責任是為國家培植人材，所以我認為一個教師，他在學校中擔任教學工作越久，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貢獻就越多，他的信譽自然顯著，當然他是一個聲望素著的教師。舊話有“子弟的率由，恆視父兄的勸勉”，“人情的趨向，多以首望為依歸”。我以為，在我們高等學校中，對於擔任過教學工作多年的教師應加以重視。除專任教學工作的教師外，對於擔任主任職務的一般教師，應給以應有的權，使他當家作主，不生“改由寫氏，祭則

院長辦公室秘書王長恩

官派勁頭十足

陳子萍

院長辦公室秘書王長恩，官派勁頭十足。經常到校衛隊摩摩唱唱，動嘴就說校衛隊白吃飯，任意喚使隊員干他私人的事。屢次到校衛隊把腳高高地放在辦公桌子上，叫校衛隊隊員抱他的孩子到校醫室去看病和買菜等。對上必恭，必敬，對下則耀武揚威，其作風之惡劣不下當年國民黨的官威，幾乎眾有同感。

據說這次評選北京四防積極份子把他選上了，校衛隊人員大為不滿。說他只是在上面發號施令，白天黑夜都叫我們校衛隊去干，不知誰把他選的，這簡直是奪取別人的勞動果實。

耿步蟾教授

寡人”的慨歎。如此，這對於校風方面，對於學生方面，對於其他一般教師方面，在無形中均能發生良好的影響。同時，這也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的良法。

學校中的重要措施，應多徵求意見， 發揚民主作風

我在上次座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會上，聽到同志中有主張擴大院務會議的建議，這個建議，我感覺到很好，並且贊成。因為擴大會議實行，不僅能使一般教師們對於學校的重要措施得到深刻的了解，免去一切誤會，還能增多接觸，加強聯繫。所謂重要措施，如以往的修訂章程，提拔幹部，調動成員以及評級評薪等問題，在事前，多沒有讓教師

端正學風，反對剽竊！

耿樹林

拿人家的譯文當自己的文章發表

我原是煉鋼教研組的翻譯。薩維利耶夫專家在時曾要我把他從蘇聯帶來的一些資料選譯出來，給教研組作教學參考之用。其中有一本平爐爐計，內容很好，但是其中的數據老一些。專家還另有一本平爐每平爐車間設計，是近幾年出版的，其中有些數據可以用在前一本書上。因此，利用這兩本書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搞出一篇“出色”的文章。煉鋼教研組的周榮章講師，了解到這個情況之後，就以編寫講稿為名，要我把構成這一篇文的所有內容都從這兩本書上選譯出來。我以為教學上急需就趕着譯了出來，周先生來不及等我，自己校對一遍就把譯稿拿去了。隨後馬上就叫人描圖抄寫，看樣子就要利用這些材料來講課。我看到自己的譯文這末需要，心里很高興。但是遺憾得很，過了很久也沒有看到周先生用來講課，教研組的其他教師們也沒有採用。一天，有位同志問我：“鋼院雜誌11和12（1956年）兩期上周榮章先生發表的文章是不是你的譯文？”我回答不是。當時也不相信象周先生這樣的人作為冶金系的秘書共產黨員，又是位講師，會把我譯文當作自己的文章發表。這位同志把雜誌拿給我看，才知道果真不假。

是誰編的圖冊

專家來我院時還帶來一些圖紙和圖冊，因為我在專業上懂一點，所以就讓我翻譯這些圖紙與圖冊。這些材料並不好譯，上面除了獨立的標註外，還有說明書，材料單，在專業知識上要求很高，譯起來是有困難的。幸虧教研組的教師和研究生們都給了我一些幫助。周先生是負責整理這些資料的，因此常來“照看”。不過，除去讓我把急需的圖紙譯出來之外，很少幫助解決過我的疑難問題，最使人刺目的是：“這個簡單，沒什麼”，周先生為了編排，當然也拿去看看。不過我沒有看到上面有什麼改動，空着譯不出的還是空着。圖紙譯好後，周先生是忙了一陣，這樣編一次，那樣編一次，一會兒這個在前，一會兒那個在後。那些散圖花這番勞動還能使人理解，不過為什麼原來就是完整的圖冊還要這樣編排一翻呢？難道蘇聯的設計師不如周先生高明。這番“勞動”除非是為了在圖冊上墜上自己的大名，故意作一番之外，實令人難以理解。

這些圖冊原來都是鎖在保險櫃中保密的，用的人都不准帶出室外，但自從圖上墜有周榮章編的大名後，就不保密了。周先生到處給別人看，並送給其他單位，怕揚名不遠。話中常聽到很多的好壞和稿費分紅問題，起先我以為是給我提意見讓我改進工作，所以周先生如何講我都沒有反駁。後來他經常和我估計譯者和校者的勞動代價問題，譯者佔60%後來40%最后是20%最後認為譯品乾脆沒有用，並在話中常以我的譯文為例，我雖知道他的說法不對，但

們知道，更沒有征詢有關方面的意見。在上次座談會上亦曾有同志提及，可以證明。所以我提議嗣後我們學校中對於一切重要的措施，除法律上應當守秘密者外，應多徵求意見，發揚民主。

重視教學工作對教、學兩方面 應多加聯繫了解實際情況

我們知道教學工作是學校的主要任務，應該特別重視。按蘇聯高等工業學校教學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內中規定至為明確，可以參考。我們學校亦有相當的組織，我的意見是要對於領導人員，應使他們有職有權，不掛空名；教學人員和教學輔助人員，使他們分清職責，各盡所長，各勝其任，再對於工作情況的了解，一方面要聯繫教師，一方面要聯繫同學，才能了解全面，舊話有“知弟子莫如師”又“知師莫如弟子”，他人評論，或有偏差，匯報內容，或不完善，對於這個，我建議應當多做一些聯繫工作，不要以耳代目專凭匯報辦事才好。

以為人家是對我提意見，所以我就沒作任何反駁，當周先生把文章登出後，要送給我禮物，我才了解到周先生對我的譯文作這樣低的評價，要都就是為了利用它當作自己的文章發表，說起來我這人也真不近人情，周先生曾多次要給我買最好的襪衫或皮鞋，我都沒有收，我覺得除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外世界上是沒有這種禮物的。若是因我這篇譯文給周先生揚了名，而接受他的禮物，我又覺得對不起勞動人民。

一點說明

人們一定要問你的譯文到底價值如何？是不是不經別人校對就是毫無用處？我雖然專業知識知道不多，但翻譯平爐計算，這樣的文是能夠正確地表達出原文意思，滿足讀者需要的就是我那篇沒經校對的草稿，他雖當文章發表了，但也未對有什麼重要校改（我沒對照過），各位讀者同志，我本可不講這些話，不能不作必要說明。

幾點意見

1. 我很同意一些教師的話，我院的學風不正官風盛。有些人在學術上不想克苦專研，竟想投機取巧，在政治上不是勤勤懇懇的為群眾服務，而是驚凌在群眾之上，真是巍巍乎可畏，實際上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偏偏這樣的人在院中却是很紅的。我認為在這次整風中這樣的人應當好好的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這對樹立鋼院的良好學風是有幫助的。
2. 近來聽說院方決定讓周榮章先生到蘇聯去學習，我不知道根據什麼理由把他選上了。若是根據品德，現在資本家經過改造已經放棄了剝削，而這位先生却在盜竊別人的勞動成果；若是論才，把別人的著作據為己有，也算不得真才實學，與其把這樣的人送到蘇聯去學習，到不如把他送到農村和工廠去學農學工，學習他們的優良品質。這不是個人攻擊，因為送一個人到蘇聯去學習，不知要花多少工人和農民的血汗。把這樣的人送到蘇聯去走一趟，能學回多少東西，對我們學院會有什麼影響，是值得院方研究的。
3. 把學校办好，應該依靠那些踏踏實實，辛勤勞動的教師們，他們才是真正傳授給學生知識，提高科學水平的人，而不能依靠那些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人們。希望院黨委及領導能深入下層，了解情況，這對办好鋼院有很大意義。

一點要求

希望黨委會通知“鋼鐵”雜誌編輯部，讓它在“鋼鐵”雜誌上作如下更正聲明：「本刊1956年第11和12兩期刊載的，周榮章的平爐計算，原來他盜竊別人的譯文，特此更正，希讀者周知」。這樣作並不是專讓誰下不來台，一方面事實如此，一方面周先生到處拿這篇譯文作不適當的自我宣揚，所以有讓廣大讀者知道事情真相。

秘書“幸運”的遭遇

——整風中談“趣事”



寸言

此事距今已將一年，但它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今天整風，那是万万談不得的，因為此事有礙我院某些黨員的“威信”和“尊嚴”，說破了，有人怕倒會惹得自己沒有好處。

有一天，某處一秘書大約是無事可做，或因一時之興，想尋點事兒來開心，於是他騎上了公家的一輛摩托車，並帶一女大夫揚揚得意地直奔城內去了。

且先不去談他利用職權所在，動用公家的財產來滿足個人娛樂的私欲；讀者諸君一定會對他這一行為作出正確的評價，已用不着我多下評語了。這里我想介紹的是這位秘書在路上的一段“幸運的遭遇”。

夜幕垂落了大地，公路上月光下的景色，詩意濃厚；摩托掠風飛馳，坐在那柔軟的車座上，倒是令人大有輕鬆舒適之感。也許秘書得意忘形了，他忘記了他剛學得的那套“高明的技術”，是不適合在夜晚熱鬧的街道逞顯身手的——在新街口上出了岔子——摩托的燈光忽明忽滅，不知如何支配它才好，真急壞我們的秘書了。

急中生智嫁禍於人

騎車是要遵守交通規則的，事實證明，秘書的騎車術，並不象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樣高明。警察問：“你姓啥名誰？有執照沒有？快快道來。”這一下可驚動了秘書了，但還算“上天保佑”，我們的秘書急中生智，擺出了一付“流利”的口才——吱吱唔唔：“執照……”干脆說：“我姓谷，名鳳鳴，鋼鐵學院總務處工作，司機員是也。”秘書“大人”飽受一場虛驚，險運才算過去。但是警察已經記下了秘書所交待的姓名和地址，準備電告鋼院總務處領導教育他一番。

我要控訴！

是誰剝奪了我的自由？

陳子萍

我是一個五三年歸國的華僑。五三年七月由中央僑委會介紹到鋼鐵學院，經人事科分配到校產科，擔任房產管理工作。科長是李石洋，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作風嚴重，以致造成科內糾紛很多，組織上就給他調到總務處當秘書。在移交工作的前夕，由新任科長召開了一個全科會議（包括各工種工人在內，但李石洋沒有參加），大家都給李石洋提了很多的意見。我是會議的記錄員，當我聽到工人同志說：“李一個人就可以住兩間房子，而工人申請房子要寫檢計；要求工資也要受批評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當時我的心情很激動，就在一張廢紙上隨筆寫了一個發言提綱：「人類是平等的，工人應該同情工人的生活」（後來落在李的手里）在肅反的時候，李石洋就私自把我找去對我說：高槐蔭對你說了什麼，你要坦白交待（校產科時李與高有很大的成見）。高的真名實姓將來你就會知道，你願意和壞人在一起還是跟好人在一起（把高當作反革命份子看待）？並且威脅我如果你不談出來，你的名譽就會掃地。你看了黑板報沒有？當時我很氣憤。我說：我做了什麼壞事，他說你看這上面（上次會議的發言提綱）寫的是什麼，這是反動標語。這一頂帽子扣下來真有如晴天霹靂，吓得我目瞪口呆；明知委曲，但無從申辯，不禁流下兩行淚水。他看我哭了，就叫我回去好好想一想，不用上班，把高對你說的話寫出來，赦你無罪，臨走時又說，我今天對你說的話不許跟任何人談。後來李石洋白天黑夜都來找我，我好象被剝奪了自由的人一樣，不敢跟任何人接近，也不敢跟任何人吐露真情。一個人越想就越越不通，難道說，我寫了「人類是平等的，工人應該同情工人的生活」，這就算是反動標語嗎？“赦我無罪”我究竟犯的是何罪？又說：我跟你說的話不許跟任何人談，這又是作何解釋？以上一連串的問題，弄得我神

讀者諸君，看到这里，可就要提出問題來了：干嗎這秘書有那“齊天大聖”千變萬化的本領，一下子身為秘書，一下子又身為司機員呢？要揭開這個謎請看下面分解。

電話機旁又顯身手

秘書受了警察一場教訓之後，垂頭喪氣的回來了，但是他此時心里又嘀咕起來：“果真公安局打電話來詢問谷鳳鳴的事情那該是如何是好啊，明明我是冒名頂替呀。”顯然秘書顧慮了。但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每天千百個電話飛來，“近水樓台”居多都要經過秘書的耳旁。

電話鈴響了，秘書胸有成竹，早已把對話佈置就緒。

“那里？”

“公安局，你們是鋼鐵學院總務處嗎？”

“是”

“你們那里有個叫谷鳳鳴的嗎？他開車不遵守交通規則，要好好批評他。”

“是，一定好好教育他……”

電話聲斷了，萬事大吉“阿彌陀佛”！——秘書坐在那軟松松的科長級的椅子上，這時才算鬆了一口大氣。“好險，好險，以後可要注意一般了”——知錯認錯，至少在此時的秘書心里，讀者是會替秘書這樣想的。但是遺憾得很，他在事後並沒有向黨組織或領導交待這一欺詐騙的惡劣行為。也許這對他來說，認為是小事微不足道的。但是要提醒秘書一句：大事是从小事積累而來的，道德品質的一點一滴如不檢點，那麼他就將陷入歧途，會犯了最大的錯誤。何況一位黨員同志更應“一日三省其身”才能真正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使群眾敬愛他。

故事就說到這里為止。

謎底

“這位秘書是誰？”在工會聽取職工討論人民內部矛盾的匯報會上，揭開了這個謎底。他是現在總務處的秘書李石洋。這個謎底的揭露，群眾認為它對李石洋是一個有力的批評，這對他是有幫助的。我們的黨需要的是那些能正視錯誤和缺點，能時刻自我批評的人。做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名符其實，冒名頂替，招搖撞騙的事是違背党性、黨紀的；應受到黨嚴厲的制裁和處分！

態昏迷，晝夜不安。長夜的失眠，往事又喚起了我的回憶：回想起兩年前我還在異國作客。為了追求真理，熱愛祖國，才離別了家裡的親人，握別了童年時代的好友，抱著滿懷信心，第一次投回祖國的懷抱。然而誰能料到，兩年後的今天，自己竟落到這樣的境遇呢？但是偉大的黨和我們英明的領袖毛主席永遠象太陽似的照耀著我們，今天又給予每個公民都有“放”的權利。所以，我要以一個莊嚴的公民的身份，提出控訴究竟是誰給我定下的罪名？是誰侵犯了我的人權？是誰剝奪了我的自由？就是李石洋！

採礦系黨總支書記王連甲

對工友態度粗暴

王連甲自以為自己了不起，高高在上，目中無人，仗勢欺人。1954年他在設備科當科長，在教室樓辦公，屢次和工友打架。他經常在下午下班後在辦公室內打百分，影響工友清掃工作。有一次工友向他提出意見，他說：工友限制他文娛活動，當時用粗暴的態度對待工友，第二天還反映總務科的領導同志。由於總務科領導同志的官僚主義作風，不但沒有支持工友的正确做法，反而輕信王連甲片面的意見，因而使王連甲對自己的錯誤沒有認識。有一次，工友氣相懷送通知，遺失一份通知，他用粗暴的行為，破口大罵，（他媽的、你混蛋，怎麼搞的），這工友當時回到工友室就“哭”。在肅反時，他對工友的態度更加惡劣，有一次他叫柏松山頭天下午布置一下辦公室，柏松山把這事忘掉了，第二天王連甲當著很多人，又罵柏松山：他媽的，混蛋、干什么吃的……。當時柏松山和王連甲兩個黨員竟打到黨委會。黨員王連甲這種粗暴態度，我認為他不够一個科長的样子，連一個普通的公民也不如。我希望在這次整風時對王連甲嚴格教育，避免今後類似情況發生。

總務科工友 孫桂堂

傾聽群眾意見

黨委、工會成立群眾接待室

為了便於群眾進一步揭發黨的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黨委會成立了群眾接待室。接待室設在行政樓304號，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7時至11時30分，下午2時至5時30分；若上述時間不便，可與負責接待的同志另約時間。

另，工會接待室亦已成立，地址在工會俱樂部，時間是每日下午3時半至5時半（根據情況可以延長時間）。

此外，黨委還成立了材料整理組及意見處理組，這兩個組將把群眾的意見加以歸納，交黨委研究解決。黨委于廿四日上午召開了常委會，初步研究了群眾意見，並具體提出了可能立即解決的問題，由意見處理組有關方面工會負責人，協同解決。

和風細雨 盡情鳴放

除掉“三害”免崇鋼院

趙松年

鋼院逐年鞏固，砌累了一座“高牆”

鋼院自建校伊始，逐年鞏固砌累了一座「鋼鐵」般的高牆，把黨與非黨，很明顯的隔離得疏遠，因此給鋼院帶來了各方面的影響。個別的黨員，因個人的行為不檢，事情很小，可是給黨造成很大的損失；群眾則意見紛紛，說什麼這是黨員作的，那是黨員作的，都在怒目而視。幾年來在鋼院的确也出現了形形色色不能不令人責難的事。國家頒佈動員回鄉的政策，都在遵行而獨有身居動員責任的反而不遵行；還有騙取登記戶口，繼而找工作。無怪有人說，朝里有人好作官，沒想到在新社會里還出現了舊東西。有人滿口馬列主義，但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有衝突時，則原形畢露，而不聯繫實際，有傷為人師表的美稱。黨員是站在前哨線上，來推動別人的，否則怎能是起帶頭作用呢？偏偏在鋼院就出現與此相反的事由。評薪時有人工作清閒則連升三級；工作忙繁的人則埋于地下。黨與非黨劃分得如此明顯，黨與非黨親熱熱。為什麼黨與非黨就不能說心里話，這是個迷。即使不合理，非黨人士也只好敬而遠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找麻煩。如若不然，大帽子扣，信用失掉，永難翻身。如若維持信用，只好視若無睹，如果一碰，則挑撥離間，兩面派等等大小帽子，戴了一頭；向上級一匯報，把你壓在九泉之下，才能澄清。

高高在上，怎能了解基層？何況已存在宗派主義

在負責精神食糧的寶庫里，為什麼就不能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呢？很簡單，只許自我批評而不能反上。即使在會也不過是象聽了一堂報告，這樣怎麼找出缺點；不找出缺點，怎能前進呢？更令人不解的，談話要預約。請問這樣高高在上，怎能了解基層？只不过听取了幾個人的匯報，匯報真實與否，則難置信，何況已存在宗派主義。不但如此，還把年青與年老的劃分在兩條線上，年青的什麼都可信，年老的朽木不可雕。難怪打擊主持公道的人，加以包庇落后分子的名稱；難怪這個單位，人不多心則不少；無其他，只官僚主義在作祟。有的黨員愛人，休學一年，學習不行，工作則可，如是就在鋼院找到了工作，學休完了，工作告退，繼續學習，一舉兩得，不是近水樓台，如何能先人而得月，方便之門處處有，只看誰來開吧，至於不熟於業務，因人而事，也還不少。有個別黨員同志，盛氣凌人，自感高人一等的神氣，尚不乏人，有職有責而無權的人，也不是鳳毛麟角。

另有胡振渭先生之調走，劉叔儀先生之不留這里也是宗派主義在作祟吧？

藥雖苦可以治病，糖雖甜不解問題

我抱著誠懇的心；為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致目的，揭發了黨與非黨間之矛盾。正因矛盾，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供出這一苦藥。常言說得好：藥雖苦可以治病；糖雖甜不解問題。我希望這是一劑苦藥，而不是糖。苦藥可能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有好处，因而能把鋼鐵高牆拆除，是所至盼！

我所知道的人事科 和人事科長

編譯室 馬霖祥

我在1956年10月向專家工作科長張明久提出申請調動工作，理由是：①我想做俄文教師工作；②家中都是老人，离家年久，需要照顧。

張同意我調動，將我的申請書轉給人事科，並要我自已联系。下面就是我在联系过程中逐漸認清的人事科和人事科長李鉄夫。

好大的官架子

得到張的答复后，我多次（电话联系10次左右）向李鉄夫請求面談，他都以沒时间为辭，不与我談。一直到1956年3月中旬才由当时在人事科的藍蔚文和我談調工作的問題，从申請起一直到藍蔚文“接見”我为止，時間过了五个多月，請問李鉄夫：你摆的是什么官架子！

明知是本位主义却說是“人事制度”

人事科替我向別校联系时，提出先决条件“对換”，結果所有的联系还因此沒有成功。李鉄夫說：“对換”是人事制度。好！下面借用人事科自己人說的話来揭穿李的鬼話。

1956年7月30日上午，刘倩华（他当时在人事科工作）在电话里告訴我“索柯洛夫專家走后，一定无条件把你調走”。敢問李鉄夫：專家走后可以无条件調走，为什么專家未走之先不能无条件調？为什么“人事制度”适用于專家未走之先，而不适用于專家走后？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这就是人事科調動干部的方針，用不着拿“人事制度”替本位主义遮羞。

一拖再拖以至無法調動

1956年下半年我一再請人事科早点替我向外部联系，免得專家走后把我閉着。但是一直拖到12月才去向外联系，这时各校都在減縮人員編制，当然不会成功。

把大好光陰虛度

去年下半年机械系專家工作不需要三个翻譯來作，但人事科偏以“專家未走，不能調動”为理由把我扣住不放，結果工作不緊張，尤其是專家快走时，更沒有事情，这还算是好的，妙事还在后头：專家走后把我調到編譯室，从2月中到現在共有3个多月，实际工作量只有半个月，整天閒着沒事，心緒不定，連学习也学不成，把大好光陰虛度，这种情况都是人事科造成的。

到底把我怎麼辦

4月16日上午，我找李鉄夫詢問調工作的情况，並請求如果今年暑假調不成，就先調我到俄文教研組，到明年暑假再外調。李答不行，要到俄文教研組就必須長期在鋼院工作（这是十足的本位主义，他明明知道我申請調离鋼院是由于家庭实际困难），並且說，如果我能够改变兴趣，不再請求調動，安心做翻譯，那就更好（这是閉着眼說瞎話，他明知我沒有事干，編譯室工作不多，全院翻譯人数过多），当我請他再替我向外部联系时，他一口拒絕，說全国有几百所高等院校，人事科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專門替我——联系（这是有意歪曲，我請調华东区，並且过去只替我联系五所院校何来几百所？）。他說唯一的办法就是請高教部在暑期統一分配，把我也列入分配人員之中，（这是敷衍的說法，高教部对今后毕业生的分配尚感困难，怎么再会分配我？）。請問李鉄夫：根据你的說法，暂时到俄文教研組不行，留在編譯室沒事干，高教部分配是显然沒有希望的，又不肯替我向外部联系，你到底打算把我怎么办！

是不是也要周總理干預

根据最近揭露的事实，凡有裙帶关系的人想調動工作，人事科解决得又快又好。而我申請調動工作的問題已經拖了一年零六个月，处理这事的人由藍蔚文換成刘倩华，又由刘換成馬××，始終沒有解决，如果照上面李鉄夫的話看来，也根本不会解决了。去年压力加工教研組的翻譯王再光同志調動工作时，也是千难万难，一拖再拖，幸亏她的父亲向周總理提意見，据說周總理給院里來了条子，才最后解決問題。我曾經向高院長提过有关人事科的意見，結果李鉄夫在四月十六日講給我听的話如

上述。我問：是不是也要周總理干預？（据編者向有关方面了解並無此事——編者註）

為什麼拿不合理的事实去塞別人的口？

去年人事科不合理地把我定为十二級翻譯，与我同校，同年毕业，現在俄文教研組工作的同志要比我高兩級，这且不提。另一位在俄文教研組工作的同志和我一同到鋼院工作，已快五年，他也因評定不合理而向李鉄夫提意見，李說：“馬霖祥也是十二級”，他的意思是：馬霖祥对十二級沒有意見，你就不用提了。这句借刀杀人的話，实在可惡。李鉄夫你怎么断定我对評为十二級沒有意見呢！

幾句話

机57 林微

看了这期的院刊頗有感触：咱們学院也投入了这个大胆“鳴”，大胆“放”的运动，不能不說这是可喜的事情。

院刊上登了机械系副主任吕桂彤的发言，使我们連想起了一件事情：远在毕业实习的前夕，那时剛剛考完試，還沒正式放假。系里召开了一个机四全体学生會議，佈置有关毕业实习的事項。時間是在晚上，当时人們的心情是希望講話簡單扼要，沒有廢話！原因很简单：愿早点回家。

正当會議进行时，我們的系秘書，石磊先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急急忙忙赶到了会场。他一面用手帕擦着他那滿臉的汗，上台講了，下面一席話。

「同志们：……我要从党、团角度来和大家講几句话：……；要严格要求自己，搞好关系，要学习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学会辨明是非……使政治上有所提高。……」

講完了，他又急忙忙的走了，当然沒等会散……我們听了，可我們觉得这一举动未免有点多余，难道說我們的系秘書，真的担心：如果沒有他这几句話，別人都会变成白痴么？！

遺憾的是：这样的忙忙碌碌，不知道石磊同志有沒有估計过他的效果！不曉得現在說这个“过去式”的故事，有沒有必要或者应不应该，但我們还是把他提了，可以說“微不足道”哩！

實驗室的矛盾在那裡？

激流

實驗室問題一直都是很多很突出的，但是却一直沒有获得解决。實驗室的問題为什么多呢？是不是这批干部思想特別成問題呢？由于我是鋼院實驗室的“元老”经历了許多人事滄桑，故我愿发表一些看法。

（一）硬搬苏联的經驗是問題产生的一个原因。我是1954年分配来电冶實驗室工作的。当初，一下分配在該室的大專毕业生就有4位。那时电冶實驗室还没有影子。为什么出現这样的情况呢？答复是“执行苏联專家的建議”。在苏联一些只有較高科学水平的院校是采用了一批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同志做为知名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助手。众所周知莫斯科斯大林鋼鉄学院的电冶實驗室就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在該院的电冶教研組拥有佔薩馬林，聶得洛利，奧柯柯夫与这样的知名者，科学研究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回觀我院同性質的教研組，但教授仅有一名，其余均是講師助教，当然是談不上开展大规模研究工作的。所以“实验員”沒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实验員”成了可有可无的万金油干部。目前鋼院不但沒有正視一問題，而是所謂，“实验員”的队伍愈来愈扩大了。难道真的是科学研究需要嗎？可以肯定目前我院科学水平的增長所需要的远非这样大的队伍。总之高教部到鋼院領導需要重新檢查学习苏联的問題。

（二）高教部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又是相当龐大的官僚主义机构。鋼鉄学院亦不弱。實驗室人員的切身問題是前途問題。高教部以及鋼院只把攤子摆了出来，而相应的制度却沒有只字片紙。去年9月29日由于各院校實驗室的問題都很大，高教部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情頒发了一个“教学輔助人員的业余学习暫行办法”，“但是杯水車薪，解决不了关键性的問題。實驗室人員考虑的是“自己是不被承認为技术干部；”，将来的前景是不是工程师”。目标还是糊糊涂涂，那能考虑进行的問題。直到現在高教部还没有确实（肯切說从未动腦筋）这一批人員的职称、职责、晉級制度，工作制度以及合理的工資制度。

鋼院的官僚主义不亞于高教部的。實驗室

的問題已經足足拖了兩年多了。院領導是知道問題的严重性的，但是千呼万喚却始終不肯出来予以合情合理的解决。實驗室人員殷切期望領導上速予解决“技术員的职称問題”，“工程師的前途問題”，以使我們能考虑自己的技术与文化的进修計劃。我們深切的体会到“青春一会不再來”，“工作上的損失难換回”。

（三）實驗室人員处在四面楚歌中。行政人員，教師，党团組織，学生等單位中的某些人对于實驗室的工作者有異样的看法。特别是行政人員。鑄工教研組有位实验員愛人來京向总务科申請房子，总务科某同志了解到他是实验員时，馬上投以鄙視的眼光說，“你是助教就給房子，实验員还能申請任房？“财务科”一位同志說得更乾脆“实验員就是光拿工資的。如果你是实验員偶尔不慣进了圖書館的庫房，圖書館的某些工作人員就会声色俱厉的給你撵出去。实验員在科学研究科的某些人員的眼中是一批沒有文化的野蠻。去年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覽会就是不發給实验員參觀証，原因是“實驗室人員看不懂”。可是許多行政人員和某些与业务毫无关連的教師却能去进行參觀。党团組織对实验員的思想、生活、学习关怀很少，而且在政治上亦不信任。党团的領導人很少下實驗室听取呼声，在他們的心目中实验員的呼喚就是牢騷；实验員都是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者。团教师工作組考虑實驗室的問題很少，亦很少提拔实验員作团干部，而且在工作組中負責實驗室团工作的干部也是一些工作能力不强的人。党的組織对實驗室人員基本上是关門的，二年来冶金系的實驗室工作者却有80名左右。对實驗室人員的政治不信任还表现在听某些中央負責干部的報告上。匈牙利事件后，党中央宣傳部某負責同志曾在地質学院做了一次時事報告，当时冶金系就不發給实验員入場券，而那次在地質学院听講的却有我院的許多行政人員。在教研組內实验員亦是低人一等的階层。任何教師可以随便的指使实验員为之效劳。有个别的教師甚至把实验員据为己有，實驗室人員不但要供給他数据，而且还要为他准备教学用图、整理講义甚至購買車票、報銷賬目。實驗室人員卖尽了力气，得到的結果仍然是“主人的不欢心”，技术水平低啦！調皮不听话啦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教研組有任务了，教師就要忙下實驗室抓夫了，任务过了，教師又溜得无影无踪了。至于对于实验員是很輕視的，如机械系留下作助教的研究生陈克新（預备党员）等人曾毫无理由的要祝景棠、張永国兩同志讓出房間給他們住宿，他們的意思是“实验員沒有資格住一齋的”。由于教師对實驗室人員的異样看法，就直接的影响了他們所教的学生，某些学生在实验課中对實驗室人員不具是頗禮貌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允許就談到这里。当然小泡沫是起不了大浪的，但是小泡沫我能使一池平靜的青水微动連漪。我发言的意图是这样亦只有是这样。

林處長不聽取群眾意見

遷就黨員的錯誤

共产党员——周海清，曾任总务科工友管理員。在他工作期間，他一貫压制工友的正义和批評。他施用一切手段把他的大舅子，从农村接來不久，就分配到电工室当学徒。而誠懇的老工友却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工友的管理員。在動員回乡时，群眾都热烈的响应了党的号召，說服動員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彼此分离，依依不捨地千里迢迢的回家了。而个别党员同志不但不起帶头做用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周海清他为了使妻妹來京落戶后即找到工作，不惜采用一切欺騙手段，欺騙党委說：“我的愛人要生产了要家鄉人來京照顧”于是他拿着林處長批准的戶口为凭証。人事科就不加考虑的，把他的妻妹直接分配到实习工厂当学徒，激起大家一致議論紛紛。我抱着維護党的威信，善意的向林處長談起周海清这黨員的品質問題，但换来的却是一句話，她不理不睬的說：“動員她回去吧！”怎样動員她回去呢，就因为有问题才找林處長解决啊，但林處長对此問題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使我默默的想。啊！这是黨員的特权。

（曹福堯）

更正：第60期院刊第二版“我要发言”，文中有一句“而华老黨員虽然比別人差却升級。我們的胡庶这样先生……”应改为“而这种黨員虽然比別人差，却升級。我們的胡庶华老先生……”

向人事科長李鐵夫提出質問

俄文教研組 李治全

这件事发生在上学期。我是最近才听說的。自知自己不是“家”，但却愿意談談自己的看法，也来参加“爭鳴”。

事情发生在我院人事科。有一次因調配干部，我教研組的一位秘書和人事科長李鐵夫談話。在談話中李鐵夫曾說：俄文課誰都能教。阿、波、喔、哥、沒什么(?!)

当时我教研組的那位同志曾予以駁斥，並通过党支部提了意見，但李鐵夫表示：我是随意說說的。

看样子李鐵夫对这件事还是没有深刻的認識。

我們先来就事論事。这一席話換个說法就是：第一俄語不是一門科学知識；第二既然俄語不是一門科学知識，从事工作的，为俄文教学、俄文翻譯等工作的同志也就是无知的了。按李鐵夫的邏輯进行这样的推理，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而这种結論是不会錯的。

但事实却远远不象李鐵夫那样天真。請看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在俄文教学雜誌創刊号上的提詞：

認真負責地為國家培養一批通曉俄文的人材
(劉少奇)

教好俄文，学好俄文，交流中蘇文化，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
(周恩来)

他們把俄文看成是一門科学，看成是中苏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为新中国建設事業服务的工具。通曉俄語的同志被看作是國家的一种建設人材。

那些提詞发表于1951年，距离今已有七年光景，可能李科長沒看到过，也許李科長还有更高深的体会?!如果有，那么希望你也別沉默，写出一篇东西来，发表出你的看法，也来“鳴”一“鳴”。

我想李科長不会有更深刻的見解的，他的这种說法是不敢公开拿出来，因为它不值得一駁。但他能下意識地流露出来，我想也不是偶然的。这种看法的原因就是李鐵夫对从事俄文教学和翻譯工作的同志的一种錯誤看法。我敢做一个大胆的假設：李鐵夫不懂俄語，也完全不懂俄文教学工作，其他方面的常識也少得可憐。若不然他不会說出这种无知的話。他的那种看法赤裸裸地暴露出李鐵夫在知識領域里惊人的无知。从这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人事科在許多工作上給俄文教研組造成种种不便。

李鐵夫是搞人事的，但却不了解人家做什么，並且还在哪兒胡說八道，以不懂裝懂，以印象代替事实。为此我們表示莫大遺憾。

如果真的出于无知，那沒什么。日后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知識是积累起来的。但万万別不懂裝懂，打腫臉充胖子。这种胖子胖不了几天。

如果腦子里还有其他錯誤思想，建議他彻底能够工作了，为什麼偏偏叫我呆留在这里?

能够工作了，为什麼偏偏叫我呆留在这里?

冶金廠机械設備實驗室 銘

自从党中央提出“節約”以来，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都在热烈地响着这一号召，当然我院也不例外。但我觉得我在使用人員方面作得还是不够好的，在某些地方造成人力的浪費。

就拿我本人來說吧！我原是武汉電訊学校的学生，中途因身体关系退学。去年下学期来本院被分配到科学研究部工作。組織上为了培养成我，介紹我到冶金厂机械設備實驗室进修电子管技术。当时組織上告訴我：在三个月內將此項技术掌握（因为我过去学过电子管），我很高兴。如今，時間已过去了6个多月，而組織上的要求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基本上达到，能够独立工作。这时我心里很愉快，以为总可

以为實驗室作一点事了。因此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就向人事科提出調工作的問題。但組織上对我的問題並沒有重視，只是說目前需要我的，實驗室还没有，由此我只好安下心来。但最近每当我联想到“節約”的問題，内心确实是难受：能够工作了，为什麼偏偏讓我呆在这里？因此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費，与節約的精神不符合。最近我又鼓起勇气再一次提出這問題，可是得到的回答同过去一样。难道真的沒有我工作的地方嗎？那組織上为什么又要培养我，我簡直不能回答自己。据我所知这校有电子管的實驗室，而且不只是一个。类似我的情况我相信絕不是我一个，希望組織上能重視这个問題，以免造成人力的浪費。

誰是誰非，敬請公論

— 高槐蔭 —

調来本院工作已經三年半了！可是却有三个整年的岁月是在窒息的环境下渡过的，只是在院長傳達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号召后，我才开始能吸收些自由的和新鲜的空气。

究竟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头上，喘不出气呢？现在把它摆在紙面上，敬請同志們研究和分析。究竟誰是誰非，不難得出結論。

1953年12月，我被調来本院后被分配到校产科在李石洋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54年4月以前，这位科長对我不論是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处的很好，很荣幸的被他賞識。下班后他也常到我家主动的介紹某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因此当时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也作了些被人称譽的工作。我們二人不但相处的很好，而且他常把私人印章交給我代他处理一些科內事务，即或向党写的东西也叫我来抄写（我是非黨員），其关系可見一般。

但是在这一阶段，科內、科外也不是平安无事。如：实习工厂有人罵他；科內技工也有人不同意他。如硬叫一个申請補助費的同志写檢討；要房子也要檢討，而且是一再的檢討。再如，由于他不去，使得卖砂子的商人从四、五十里路外来，往返兩次取不到款；再如，对木工进行了不正确的批評而招致意見等。在这些情况下，作为一个科的成員來說，有責任向他汇报和提出意見。

難忘的日子

4月16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下班后，我曾約趙松年同志一起去同他談談，可是趙松年反而勸我不要談，因為要談就倒霉。可是我沒听他勸，事实証明趙松年有先見之明。

我將这些情况加上我自己的看法一滴未留的向这位科長进行了汇报，誰料，倒霉的种子由此而叢生起来。

4月17日、4月21日、5月3日，这位科長連續召开了三次党团员“积极份子”大会，号召大家来抓老高小辦，而且告訴大家會議情况不许叫科內任何人知道，誰要走漏消息就給严厉处分。

当时我的工作范围是和电、木、水、瓦、鉄等工种在一起的，因此这几次会议就邀了些技工作为會議主要成員，同时布置各工种不要接受老高的領導，使我孤立。事实証明他达到了这一目的。如6月中旬我曾三次召开电工同志們开会，解决某一个工作問題，可是都被張作光（电工負責人）拒絕了。当第四次找他們开会时，巧的很，他們正在开会，当我一进门，馬上变成鴉雀无声，云消霧散。

其他工种也有类似情况，用以孤立我，默默中拆、撤我的职权。当时把我弄的很窘。对工种的工作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还要批評，管則下边又不听。因而这位科長有一次把

計劃貼在黑板上，用紅粉筆写上“此項工作未布置”用以奚落我。再如我去二楼噴各科室門上的字，而他却在罵說我扯××蛋。改建汽車庫的工作，从設計到預算，都是經李科長同志而蓋章的，車庫辦公室抹白灰是他同意的，而且白灰还是他借的，当白灰快抹完时，他問瓦工：誰讓抹？瓦工說老高讓抹。李說他說了算还是我說了算？經張班長和他爭吵以后才默默然了，在工作上的类似情况真是罄竹難書。

是非不明以至如此

当总處長来院以后，这位科長向上級作了多次的捏造的汇报內容。說老高有篡位思想，要別树一帜。为了証明这一点，这位科長把韓潤找到了总務長面前，企图証明老高这个罪孽，可是这次正义战胜了妖邪，他又拉攏李鎮，数次把李鎮弄得垂淚，而总務長却偏听一面之詞，在一次總結会上公开宣布“有人要独树一帜”。这不能不使我受到了严重創伤。事情沒有到此为止，据說我們的人事部門，曾到重工业部建議要把高槐蔭送到石景山去劳动改造。

我的天哪，是非不明以至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假若再不忍气吞声，將要被判处死刑了。

尽管我向总務長提出了要求，希望談談，以釋速憾，但是不幸得很，却被“沒時間”而拒絕了！

這究竟是什麼問題，請大家公斷

肅反来到了，这对李石洋同志來說，真是一个好机会。抓紧了时机，时光難再。一次会上，这位科長，不，已經是秘書了，大事罵訴，对某些人說你們一定要檢舉他（指高），誰檢舉赦誰无罪，不檢舉則找你个别談話。这位秘書真是言出法隨，第二天开始发动了二十多人檢舉我。其中一名職員，連續談了三天三夜，弄得他胆战心寒。而这位秘書其盛气之凌話而先畏。不但如此，其句法也通天，发动了一个副科長，对某技工进行利誘威脅，叫他檢舉老高，还派了“哨兵”暗中站崗，致使那位技工神志恍惚，用这位技工的話說：“当时我真想上吊。这究竟是什麼問題，請大家公斷。我不否認我也犯了錯誤，首先，我不應該把李科長說趙松年是兩面派的話，在气憤的情况下，告趙松年，因而起了不良的影响。

幾年苦悶一定要“放”出來

在揭发这样事情时，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但是几年来的苦悶，一定要“放”出來，即或再遭到任何报复也在所不惜了。几年来精神上人格上所变的摧殘，驅使着我写出这篇东西。必須說明，以上所述均有証人，如有不符之处，由本人負責。

在这党内整風时，根据我个人所見和群众的議論提出以下意見：

在总務处工作的同志会有很多人知道，一提起总務处李石洋秘書（总務处党支部書記、职工党总支青年委員）有人当面会举起大姆指称贊。实际呢？並非如此，群众对他的作风、言談和处理問題等等，有很多意見和不满。平时稍微观察一下就可看出他談話的态度有三种：

对上級說話总是喜笑顏开的好，好，好；对同級多数是处以或支部的名义和口吻，指手划脚的下达命令和指示。对下級就打官腔，在談話时不管談的是什麼，总是把实际的科級架子一摆眼不看对方，自己仍做自己的事；或是另和他人談話，对正在对他談話的下級的談話置之不理。記得我有一位黨員科長，他就以大步赶上，又說又笑又比划，而不听我对他的談話。作为一个处秘書來說有时受處長之委託，可代表處長发表意見和解決問題，这种現象是正常的，也是應該的。但李秘書並不这样，不管處長知道于否也不管大事小事，都由自己决定，这也可能是王處長唯一信任的好干部？（13号稿）

官架子——李石洋